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岳 龙◎著

现代性境域中的 中国教育传统

XIANDAIXING JINGYUZHONGDI

ZHONGGUO JIAOYU CHUANTONG



華齡出版社

现代性境域中的 中国教育传统

岳 龙 著

华龄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岳龙著. -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06. 12

(当代学者人文论丛. 第14辑)

ISBN 7 - 80178 - 358 - 1

I. 现… II. 岳… III. 教育—研究—中国—现代

IV. G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47727 号

书 名: 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

作 者: 岳 龙

出版发行: 华龄出版社(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 邮编: 100034)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223 千字

定 价: 276.00 元(全十册)

导 言

中国教育由传统走向现代,很大程度上与西方教育的影响和冲击有着直接的关联。但这种影响并没有能够阻断中国社会自身演变的精神逻辑。实质上,恰恰是这种内在精神逻辑的自发作用,为西方思想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的社会基础。同时,来自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挑战、影响又极大地激活了中国教育传统中富有现代价值的精神资源,在相当程度上为教育传统在中国教育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样一种变化对中国传统教育迈向现代社会提供了很好的历史机遇。但是,中国教育在变革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够非常恰切地把握住这样的历史机遇。

自近代以来我国教育追求现代性的过程,实质上是利用西方近现代思想文化精神来替代中国教育传统的过程。在这里,由于危急存亡的巨大压力,人们恰恰忘记了,不管是何种文化的演变过程,它对任何外来新的思想观念的认同,实际上都是一个建立在本土固有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吸纳、融合、再创新的过程。因此,能否顺利地实现这种吸纳、融合、再创新,不仅成为传统在现代性探索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同样也成为现代性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如果这种变革无法顺利地完成,其结果必然是一种文化畸形的诞生和发展,从而需要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为此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和高昂的成本,甚至可能会对一个国家或者民族造成永远的精神创伤。

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

事实上,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变革恰恰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独特的畸形现象:一方面,在教育意识的层面上,诞生于西方的近代科学文化精神由于机械地强行输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环境和背景条件下因为无法找到稳固坚实的落脚点而实质上处于一种无根状态,虽可信而不可爱;中国本身的教育传统则因为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危机而在自觉的意识层面上遭到了人们普遍的坚决拒斥。于是,在情绪上很难得到以一种积极、客观的态度去被认真地继承、接受、认识、了解、分析和批判性地改造,结果只能在教育个体的情感和思维领域以近乎无意识的方式自发地维持自己的存在,虽可爱而不可信。这样一来,中国教育现代性的落实,就变得异常艰难,且充满曲折。

可以说,自近代以来,中国教育传统开始逐步呈现出边缘化的态势。但毕竟在教育个体无意识层面上,它仍然遵循着自身的逻辑而顽强地参与了中国教育现代性探索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一方面部分地改变了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精神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使自身获得了现代社会的合法存在方式。这种教育传统无意识的参与,使中国教育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获得了苦难和新生的双重意义。一方面,西方的教育文化精神在与中国教育传统的冲突和交流过程中虽然出现了失真状态,但毕竟在中国教育领域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并将中国教育推进到了现代化的洪流中,推动了中国教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艰难转型;另一方面,中国教育传统自身在西方教育现代性的冲击下,虽然表现出某种异化的态势,但同时也在现实中以其自身的力量参与了指导国人教育思想改造和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展开的过程,并对在西方现代教育文化精神冲击下的中国教育因为价值危机而出现的空乏性和无力感起了一定的缓解作用。

现实层面的巨大困难和精神冲突,使得许多富有责任感的教育家们纷纷就中国教育现代性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艰难的探索。正是在对苦难的痛苦反思和对新生的坚定信念中,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性的关系就成了每一个思考中国教育现代命运的人的思维焦点,这就通过对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现代性的合理批判,进而建构中国教育现

代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但是,面对着西方教育文化强势冲击和中国教育传统影响逐渐弱化的艰难状况,这些先驱者们有相当一部分接受了“冲击——反应”思维模式的定势影响,在探讨分析中将目光更多地紧紧聚焦在了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入侵下中国教育被动应变的历史经验总结,而忽略了中国教育传统自身积极主动参与现代性建构的历史现实,从而遮蔽了中国教育传统在现代性探索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结果在实质上延缓了在中国教育传统中富有价值的精神资源在现代条件下不断活化的历史进程,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部分地延迟了中国教育现代性探索和落实的历史步伐,并为学术界留下了许多的空白,如:中国教育传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中国教育现代性的建构过程?这种参与的途径和机制如何?教育传统参与现代性建构造成了怎样的历史后果?对中国教育的现代变革起到了怎样的作用?等等。

当然,这些空白的出现及有效地解决,既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又有着深厚的现实文化因素,更多需要的是多个学科的学者们长期的共同努力。本文仅将就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这一问题,以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领域中的部分个案为分析的主体样本^①,结合对中国教育传统精神实质的理解和对中国教育现代性本质的思考,从精神流变的角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关心中国教育的人能够共同来关注并思考这些问题,在全球化共享的背景下为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及培养现代中国人而付出自己的努力,在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浪潮中无愧于这个时代。

^① 之所以选择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因为这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黄金时期(在本论著中,鉴于思想变化的延续性,讨论问题的时间并不非常严格地局限于1920年到1940年之间,而是以这20年为主体,根据需要,将会作出必要的上溯或下延),这一时期的探索和思考蕴涵了以后中国教育现代性探索中所面临的所有重要问题的萌芽,并为我们留下了重要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在新世纪初,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开端。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历史财富,这是让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更富有理性,更有效率的一个重要前提。所以对这一段历史进行必要的透视、反思、批判、总结,其重要性和意义自然是不言自明的。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现代性的引入及其与教育传统的关系	(1)
一 现代性引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1)
二 传统、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性	(10)
第二章 中国教育传统的人文生态结构及其近代危机	(36)
一 中国教育传统结构的人文生态分析	(36)
二 中国教育传统的内在缺陷及其近代危机	(49)
第三章 中国教育现代性的产生与教育传统的自觉探索	(56)
一 中国教育现代性的产生	(56)
二 中国教育传统的现代性探索	(64)
第四章 科学精神的兴起及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异化	(96)
一 科学精神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兴起	(96)
二 科学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	(102)
三 “科玄论战”及其教育意蕴	(134)

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

第五章 理想人格的裂变及重塑	(141)
一 传统理想人格的特点及其缺陷	(141)
二 传统理想人格的近代裂变	(154)
三 理想人格的现代重塑	(158)
第六章 教育俗世化的展开及其缺陷	(194)
一 传统教育中的俗世化传统	(194)
二 教育俗世化中的传统	(199)
三 教育俗世化的反思	(217)
结 语	(228)
主要参考文献	(233)
后 记	(242)

第一章 现代性的引入及其与教育传统的关系

一 现代性引入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一、现代性的本质及其引入

目前,现代性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并且也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对现代性本质的认识问题上,无论中外,都仍然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更为突出的是现代性这个概念往往与现代化纠缠在一起,密不可分,甚至有相当部分的国内学者把现代性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看作是一个概念的不同表述,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模糊了现代性与现代化的根本区别,使得现代性的讨论更多局限在社会实践层面而忽略了其精神导向的重要性。如在国内研究中,曾有人把“现代性”的基本标志归纳如下:(1)工业化与市场经济;(2)民主化与政治参与;(3)都市化与大众社会;(4)人的现代化与文教普及。^①其实,这些通过归纳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现代性的标志,而是现代化的基

^① 连连:《大众文化的现代性及其内在矛盾探讨》,《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107页。

本特征,是现代性在西方社会中与其社会现实条件结合而产生的结果。

现代性这一概念,虽然是一个内涵繁复、聚讼不已的西方概念,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迄今为止,由于特定历史时期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等因素的制约,它的词义经过了从贬义、褒义再到贬义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在这种转变的背后,其实是人们对自己、历史、现实、未来与自身发展关系的不断重构。

从语源上来看,现代性意识和概念最早来自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在基督教教义中,现代性意味着现存世界的末日,预示着新世界的来临,其意义包含着对幸福的启示、对未来的憧憬和希望。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义本身的限制,这种对未来的预示在时间流向上并不是指向将来,而是指向过去(因为古典时期才真正代表着光明和幸福)。就此而言,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强烈的崇古倾向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因此,从表面上看,早期的西方现代性在时间观上带有强烈的复古倾向,但是因为其中所蕴涵的对现实生命的强烈不满和渴求提升生命存在质量的精神追求,却又使其成为西方现代化产生的文化原动力。到了十六、十七世纪,伴随着“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争论”的展开,现代性的概念开始被广泛使用。从康德对现代性的哲学思考开始,到黑格尔那里形成了对现代性概念内涵的深刻认识。

首先,从时间观开始,黑格尔认为现在是一个过渡时代。在黑格尔看来,在现在期间,我们既希望现时早些过去,又盼望未来快点降临。因此,现在意味着人们已经把目光从对过去的回顾转向了对未来的向往与渴求。随后谢林在《关于时代的哲学》中明确地提出:现代是依赖于未来而存在的,并朝着未来的新的时代而敞开。这样,现代的开端便被转移到了过去,即转移到了现代发端之际,现代的发展方向则由过去指向了未来。由此,现代性这一概念首先意味着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的诞生。但更重要的是,与这种时间观念相伴随的现代性概念开始代表着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在黑格尔那里,这种新的时代精神被归结为主体性的根本原则。这样,主体性的自由就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涵,“说到底,现代世界的

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①于是,现代性开始与个体生命的解放联系到了一起,并体现出明显的历史进步性。但到了马克斯·韦伯那里,他将现代性诊断为理性,从而认为现代性的实现就是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将理性分解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诊断。这样以来,就精神形态而言,现代性本身不过是某一时代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对于历史目的论的命名,是西方历史上一段历史时期中独特历史精神形态的总括和集中体现,它也同其他历史事件一样,既有某一时间段中的历史进步性,也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淘汰。

那么,这种独特的历史精神形态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在梳理整个西方精神传统的基础上,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的核心界定为“理性”和“主体的自由”。这样一来,现代性概念也就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现代性概念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其含义是指从文艺复兴、特别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历史和文化中所蕴涵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其主要特征就是“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这种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于自然世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活动获得科学知识,并且以“合理性”、“可计算性”和“可控制性”为标准达到对自然的控制。其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2)在社会历史领域里,人类应当相信历史的发展是合目的的和进步的。

也就是说,现代性包含着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内在要求。所以,我们应该不断地发现新的科学知识来合理地改造世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趋向至善的王国。这样,“现代性”实质上永远都在向人类提问: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呢?在此意义上来看,“现代性”具有“解构”和“重建”的双重取向。一方面,它注重的是“当前”,对过去的一切持批判的态度,造成了和传统的某种对立,另一方面,它又被“当作一种合作协调的智慧能力,当作可以通过方法的使用和对任何非智

① 转引自哈贝马斯:《现代的时代意识及其自我确证的要求》。

力因素的消除来增加效率”^①，不仅要以新知识和新发现构筑更美好的未来，同时也要积极汲取人类历史上有益的精神资源。这样以来，现代性将无法再从别的时代获取标准，而只能自己为自己制定规范。结果，用于人类解放的理性由于自我的过分膨胀而导致了自身的异化：理性并未能成为人类的上帝。在带给世界进步的同时，也因为自身的内在限制而产生了人的生命异化现象，并由此而造成了理性自身的危机。

哈贝马斯曾在《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中指出^②：韦伯认为现代文化的特征是把宗教与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分为三个自由的领域，即科学、道德和艺术。它们之所以有所分别是因为宗教和形而上学的一贯世界观完全崩溃。自18世纪以降，旧有世界观所遗留下来的问题被整理为有效性的特定形式：分别是真理、正义、真实和美。这些有效性可以被视为知识问题、正义、道德问题和审美问题来理解。因此科学的论述、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批评和创造都随之而正规化起来。于是，世界的整体在现代性中被支解了。这种对文化传统的专业处理，带出了文化层面上的内在结构。于是产生了认知——工具的、道德——实践的和审美——表现的合理性等三个结构。而且，这些合理的结构都由专家操纵，结果造成了普通人与专家之间的分裂。经由专家处理过的文化往往并不能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特质，却常常会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对人性造成摧残和压抑。这样，现代性的概念由个体解放的褒义变成了对人的生命戕害的贬义。现代性也由人类的解放者变成了人类进步的阻碍者和迫害者。

同时，哈贝马斯也明确指出，这并非完全是现代性的罪责。就实质上而言，迄今为止，现代性所提出的启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仍然是推动现代性的努力实现。这就意味着，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从一开始就与关注人的生命发展和人在社会中的世俗化幸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张颐武先生引用 Halfoster 的话所指出

① 霍克海默：《理性之蚀》，纽约1944年版，第11页。

② 参见哈贝马斯的《关于现代性的哲学讲演》，剑桥政治出版社1987年版。

的：“作为一种广泛的观念形态的‘现代性’意味着人类在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它是一个开始于启蒙时代的文化合法性的工程，它包括在科学、道德、艺术等领域的全面的理性化建设。”^①但是，由于西方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内在缺陷，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性的探讨，首先应该立足于西方现代性内在缺陷的认识与克服之上。

确实，在西方，现代性作为神学的替代物，以一种新的信仰形式在历史中表现出了它的巨大进步性。但是，现实的信仰并不等于信仰的现实。当人以个体生命的部分特质取代生命的全部并成为指导人类行为的最终准则时，人类也就开始把自己领上了灾难甚至毁灭的道路。一般而言，信仰领域为现实领域提供合法性和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和证明，因而具有绝对性、完满性和自明性，这实质上是人类为了克服自身的有限性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无限的意义世界。而现实领域则是人的实践领域，是有限性和能动性充分展示的领域。因为其有限，所以总是存在着不完善；因为其能动，所以总是带着相当的盲目和冲动。这就需要通过一个完满和无限的世界来为其提供动力、方向以及必要的监督和纠偏依据。

本来，现代性作为人自身的要求，它的性质应该是实践性的。但是作为精神范型的现代性，却从笛卡儿开始，在第一次将人从自然界的芸芸众生中超度出来，并放置到至高无上的主体位置上时，人便脱离了信仰领域的制约而开始倚仗着他所拥有的理性知识神气活现，狂妄地把自己比作上帝，并凭藉着赋予理性无所不能的特权来掠夺自然，设计历史，统治世界。于是所谓的现代性也就成为人的理性对历史终极之境无限承诺。自黑格尔以后，现代性话语就开始以整体主义、中心主义的独断性面目出现、扩展。于是，理性也渐渐地从原来解放人的工具成为奴役人的镣铐，现代性由崇高的幸福承诺者变成了制造罪恶和灾难的魔鬼、凶手。在现实的灾难中和精神的痛苦中，人们不由自主对传统

① 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3期。

现代性境域中的中国教育传统

开始产生了某种怀念之情。传统与现代性的关系也随之在人们的思维中展开,整个现代化的历程也开始被全面审视。于是,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关系也随之被纳入了人们的思考之中。

可见,就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现代性(modernity)与现代化(modernization)是两个既有根本区别又紧密联系的两个不同概念。目前人们所讨论的“现代性”概念,是一个具有哲学意义的文化范畴,是对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定义及其本质差别作出科学说明的概念。^①因此,在一般意义上,现代性是指现代工业社会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及基本属性,它更多地涉及的是文化观念或文化精神,其中包括思维方式、价值原则、人生取向等等,在思想上常常与近代以来的启蒙主义和理性主义联系在一起。换言之,现代性这个概念所涉及的是推动西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形塑西方现代社会和规范西方现代社会的文化精神及其动力问题,是一种时代精神的标志。

而所谓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变化。”^②也就是说现代化更多涉及的是范围广阔的社会变革,包括以工业化为基础的科学技术、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政治运作等一系列领域中的深刻转换。可见,现代化更多的是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带有强烈的实践色彩,它更多关注的社会各个领域中的技术操作问题。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主宰,也是现代化进行的根本指导原则和不断发展的内源性支持,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在社会领域中的具体外化和技术层面的现实反映。因此,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性一方面以主导精神的原则从内部规范着现代化变革的程度和范围,另一方面也以观念的形态折

① 西里尔·E. 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译者前言。

②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射着整个社会变革的基本内涵。

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代性及其问题是西方人在现代化过程中通过切身体验,感知到了现代化对自身生命所造成的疏离和异化之后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希求通过对支配整个现代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精神有一个真切的把握,进而重新确立新的价值精神意义系统,以便重建更加合理的价值取向,克服目前面临的种种危机而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样一种追求及探索方向,对中国而言,自然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实践价值。因为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形成及发展,现代性也相应地具有了某种普世精神。作为选择了现代化道路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变革不能不照顾到这样一种趋势和要求,并且必须要从精神的层面采取更加积极主动地应对措施。这样一来,现代性这一概念进入中国的学术研究视阈,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首先,作为一种推动过西方历史巨大进步的精神动力,西方的现代性所包含的具体精神在我们目前的国情条件下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人类的发展是有着内在的规律性的,人类社会总是在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迈进的。在这个过程中,历史经验总是可以为后人提供更多地借鉴与思考。另外,从人性解放和生命发展的角度来说,西方现代性所强调的核心价值和精神追求也对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现代性的理想有许多东西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思考、分析、批判。

其次,现代性作为西方现代社会的主导精神,不仅直接规范着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实践行为,而且统整了整个社会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整个社会的主导精神,更需要通过这种精神来统摄整个社会的资源开发(包括人力资源的开发),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这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非一个局限于书斋中的学术问题,就此而言,可以说中国的改革现实也在呼唤着现代性的引入。

再次,就西方现代性探讨的目的来看,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

在于诊断(对西方社会因为现代性而产生的危机的归因分析),更主要的是进行纠偏和重建。也就是说,现代性问题的本质是建设性的,而非批判性的(当然,这种建设必须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这样现代性问题就具有了一种未来性特征,这一点对正在进行现代化的中国建设事业而言,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借鉴意义。

由此可见,现代性虽然是一个西方学界的概念,但同样可以,更确切地应该说是非常有必要引入中国自身的研究活动之中。

其实,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强行推进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作为一个现代化进程中的后发外生型国家,我们虽然没有出现像西方一样的严重的现代性危机,但是,在西方现代性话语的渗透和控制之下,伴随着国人民族意识的觉醒,如何进行中国现代性的建构以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所必需面对的现实问题。同时,随着现代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西方现代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许多问题和消极因素也开始程度不等地在中国改革的各个层面上浮现出来。如何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减少探索的代价和风险,也是我们亟须重视的严重社会现实问题。

当然,我们强调对现代性问题的重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走西方现代性的老路,而是要积极建构中国的现代性。毕竟中国的现代性与西方的现代性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从时间上看,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是指向当下和未来的,而西方的现代性问题则更多着眼于过去;从内容上看,对西方的现代性认识目前仍然显得比较模糊,各家理论异彩纷呈,而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则有着比较明确的指向和内容,即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集中全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迅速实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盛。换言之,我们强调现代性是要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做出自己的回答,以便根据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以最小的代价走出自己独特的现代化道路。

过去,由于认识上的偏差以及西方现代性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诱惑,许多发展中国家仅仅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作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唯一模式,将现代西方社会通行的价值标准作为唯一的真理

标准,而没有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真正关键,并不在于进行已有成功的价值形态的简单移植,而在于传统基础之上的现实创造。结果,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许多的问题和灾难。人是文化的人,是现实中的人,是社会的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条件下,个体生命解放所面临任务虽然是相同的,但是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处理策略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同。所以如何根据自己的具体历史和现实条件,去寻找能够有效指导人们在现实条件下实现个体生命的真正解放这一历史任务的文化价值精神,才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现代性问题的真谛所在。

21 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也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寻找新的文化价值精神来凝聚和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既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也是每个人所面临的必然挑战。尤其对我们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而言,这样的任务显得尤其艰巨。如何有效地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了我们考虑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第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当然,就传统与现代性问题的实质而言,它主要关注的是寻找和确认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文化精神动力的问题,而非具体的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具体的技术性变革。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问题才能够真正得以确立,现代化与现代性之间的区别也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正如布莱克所指出的:“现代化是传统的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功能上对现代性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①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探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寻找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内在契合点,并以此为基础来充分汲取传统中有价值的精神资源而进行的新创造。

世界是人的世界。人的世界是生命的世界,是个体生命张扬的世界。所以,传统中有价值的精神资源,也必定是有助于个体生命张扬和奋发的精神资源。其实,西方现代性的本质也恰恰在于个体生命的解放——从神的笼罩和束缚下解脱出来,凸现个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① 转引自《比较现代化》第 18 页译者前言。